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花随人圣庵摭忆（中）

黄濬◎著

中华书局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花随人圣庵摭忆（中）

黄濬◎著

李吉奎◎整理

中华书局



一七七 《庭闻录》记僧谛晖事

前谈陈圆圆遗事及于《商山鸾影》。按《商山鸾影》实不足观，浅薄文人所伪托者。然箕诗并序出世盖甚早，嘉庆初，滇中即有刊本，见陈云伯《颐道堂诗》自注，商山者寺之名也。况夔笙《圆圆事辑》曾征引南昌刘健《庭闻录》，此书记圆圆事最翔实，今刊入《豫章丛书》中。然北平尚传有残钞本，为伦哲如^①所藏，予未尝见，据马夷初所记抄本，自卷五起卷六止，其后有《平南纪略》《陈圆圆始末》、《商山鸾影》各一篇，则《商山鸾影》之传抄本甚久，于此尤可证。而《庭闻录》卷一“乞师逐寇”至第四“开藩专制”，夷初皆未考证，稍足憾。然其中有一事可录，《庭闻录》卷五第九页云：

大任之降康王，则孙旭为之也。旭湖州人，少而机警，稍知书，入武学，中某科武举。耿精忠反，总督姚启圣募士入闽。旭往应募，貌既伟，又有口才，启圣悦之。旭请召某山寇，寇受抚偕旭至县，县令以宾待之。县有捕役素恨旭，白令曰：“旭所招盗，名在捕中有年矣，县牍具在。公今以为礼，为所欺。”令按故牍良然，于是执旭及盗，鞫讯具服，解赴浙省臬司狱。时军务旁午，囚多淹禁，旭与解役私相结。久之移旭还县，出北新关，遂与解役逸，凡七日而至建昌府，诣乐灿军。灿，耿之大帅也，奉耿令寇江西。旭改名为王怀

^① 伦明，字哲如，广东东莞人。光绪举人。两广方言学堂教务长。民国，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。富藏书，志在续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著书多种。以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最享盛名。

明，自言聚众应义师，不幸而败，灿及参军周发祥信之，为具衣冠，署伪职。灿败，发祥以残卒千人归，大任求幕客，发祥以旭应，一见相契，遂用事，权倾一军。大兵围城，简王、安王皆招降，大任犹豫，时康王偕姚启圣经略闽事，旭欲大任就启圣，诸招降者阻不允。赣州折尔肯遣魏祥来招，祥字善伯，宁都人，负易堂重名。旭忌其才，恐大任为所动，则夺闽约，构祥于大任。大任入其言，怒曰：“二王招我，我且未许，折尔肯何人，乃欲以藩臬为饵耶？”命旭收祥，榜掠惨毒，发祥争之不得，竟杀祥。旭日说大任入闽，大任亦以诸招降者前已皆不允，非闽不可就，遂从旭言，降于闽。旭以招降功议叙，当以道员用，给假归里，一门血属死无孑遗，庐舍亦焚毁一空。旭自伤，薙发为僧，号谛灰，住持浙江灵隐寺，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闽死。

按此节极足资证发。按世但知姚启圣说降项大任，由此节言，则大任实先纳孙旭之言，而孙旭即为谛晖，尤可补诸家笔书所未及。谛晖作谛灰，义亦长。袁子才《新齐谐记》“石揆、谛晖”一则，言谛晖收恽寿平为徒，及与石揆递主灵隐，事非无稽。惟袁记谛晖再主灵隐，寿至百馀岁，而此言谛晖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闽死，未知孰合，或刘录所知，即谛晖与石揆争负气出走时，而传闻已道死于闽耶？

一七八 陈宝箴抚湘开新治

翻吾国史事者，皆知近百年间之兴衰治乱，与湖南人士相关

咸极深切。前此湘军，曾、胡、左、郭之功业学识，世所共晓。后则谭复生、唐佛尘、黄克强、蔡松坡辈，其言动足以左右四十年来之朝野，尤灼然可征。湘军之导源，由于贺耦耕、陶文毅、林文忠，前已详之。然湖南至光绪初年风气尚极闭塞，前记郭筠仙受窘诸节，可以见之。

湖南之焕然濯新，实自陈右铭抚湘始，当时勇于改革，天下靡然从风。右铭先生与江建霞、黄公度、梁任公等入湘，并力启发，一时外论以比于日本变法之萨摩、长门诸藩，可见声势之翊奕。而散原翁于右铭先生之抚湘，其行状中尤以毕力详之，匪唯叙政绩，记识力，其上下四周所荡摩影动者，实与二十年间之思想变故有关，信可录也。《散原文集》中《先君行状》中一节云：

诏授湖南巡抚。府君故官湖南久，习知其利病，而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间，为士民所信爱，尤与其缙绅先生相慕向。平居尝语人曰：“昔廉颇思用赵人，吾于湘人犹是也。”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，非扫敝政，兴起人材，与天下更始，无以图存。阴念湖南据东南上游，号天下胜兵处，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；又土地舆衍，煤铁五金之产毕具，营一隅为天下倡，立富强根基，足备非常之变，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，故闻得湖南，窃喜自慰；而湖南人闻巡抚得府君，亦皆喜。是时湖南旱饥，赤地且千里，朝廷以为忧，趣府君赴任，勿入觐，遂取海道入长沙。盖湖南所被灾州县二十馀，浏阳、醴陵、衡山最巨。府君先传电诸行省大吏，乞互助，旬日达复电，有助金五六十万，府君用是稍得藉手矣。首大赈三县。浏阳伏匪倚灾数倡乱，用县人欧阳君中鹄领赈，得无事。

初，府君甫视事，即严禁贩米出境令，亡何，米舟逾千艘聚岳州哗变，且窜出。府君以米禁大系安危，遣某总兵持符亟遮之，诚立诛其首梗令者。由是悉挽而上，人心大定。凡府君所设方计，得次第赈活都百数十万人。

当是时，非府君为巡抚，湖南几大乱。府君承困敝之后，纲纪放弛，吏益杂进，贪虐窃偷之风相煽，而公私储藏既耗竭，万事坏废待理，方不可胜数。府君以谓其要者在董吏治，辟利原，其大者在变士习，开民智，敕军政，公官权。于是察劾府县以下昏墨不职二十余人，而代以干良者。复劾显僚豪幕最有气势者二人，桃源令贪暴无人理，上其罪至遣戍，群吏懍然，遂改观。既设矿务局，别其目曰官办、商办、官商合办；又设官钱局、铸钱局、铸洋圆局，以朱公昌琳领之。朱公七十馀，负干略，行贾致巨富，以义侠闻四方，老谢客，独勉为府君出。又通电竿接鄂至湘潭，以张君祖同领之。又浚城北河使舟有所泊，且兴高利，仍以朱公领之。而时务学堂、算学堂、湘报馆、南学会、武备学堂、制造公司之属，以次毕设。又设保卫局，附迁善所，以盐法道黄君遵宪领之。又属黄君改设课吏馆，草定章程。又选择赴日本学校生五十人待发。其他蚕桑局、工商局，水利公司、轮舟公司，以及丈勘沅江涨地数十万亩，皆已萌芽发其端。由是规模粗定。

当是时，江君标为学政，徐君仁铸继之，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，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。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，迭起相应和，风气几大变，外人至引日

本萨摩、长门诸藩以相比。湖南之治称天下，而谣诼首祸亦始此。

先是，府君既锐兴庶务，竞自强，类为湘人耳目所未习，不便者遂附令构煽，疑谤渐兴，其士大夫复各挟党挤排，假名义相胜，寻复有周汉事。周汉者，官至道员，宁乡人，积以张揭帖攻泰西教煽乱，为湖广总督落其职，而海内多奖谓忠义，尤为乡人所信重，至是复刊贴布乡县。府君方痛胶州事，大惧，传毁其贴。周汉殴传吏，益横。府君乃排众议下之狱，愀然曰：“非此无以全大局，亦无以曲全周汉。”世竟用此争龌龊府君矣。后复以学堂教习与主事康有为有连，愈益造作蜚语，怪幻不可究诘，徒以上意方向用府君，噤不得发。

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，皇太后训政，弹章遂蜂起。会朝廷所诛四章京，而府君所荐杨锐、刘光第在其列，诏坐府君滥保匪人，遂斥废。既去官，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。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，凡累年所腐心焦思，废眠忘餐，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，荡然俱尽，独矿务已取优利，得不废；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，市巷私沿其法，编丁役自卫，然非其初矣。

府君学宗张、朱，兼治永嘉叶氏、姚江王氏说，师友交游多当代贤杰。最服膺曾文正公及沈文肃公，两公以茶厘事交恶，用府君言，得俱解。与郭公嵩焘尤契厚，郭公方言洋务，负海内重谤，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，殆无其比。及巡抚湖南，郭公已前卒，遇设施或牴牾，辄自伤曰：“郭公在，不至

是也。”

散原此节，即以文言，亦极精采。时在戊戌后，故不敢言延梁任公主时务学堂，其实此事所关尤大。欧阳中鹄字节吾，湘之名士，官至广西按察使，予情之尊人。朱昌琳即朱雨田，前记郭筠仙欲办招商局，衣冠求其协助，即此公也。

一七九 曾沈争厘捐餉项

《【先君】行状》中叙（中略）曾、沈争厘捐事，只一二句，视《瞿庵杂识》所记，固失之太简。然朱记亦甚略，考文正文牒以涉此事者最为愤激。当咸丰之末，文正自皖东征，议〔办〕江西厘金以充东征军餉，复拨江西漕折以充徽、宁两防之餉。逮同治初年，又因各军逃亡过多，奏拨九江洋税三万以清积欠。沈文肃抚赣，乃先后罢之，最后请将江西牙厘悉归本省经收，文正乃不能复忍矣。其力争此事之疏，词气激烈，生平所未有，中有云：

臣忝督两江，又统兵符，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，臣皆得奏明提用。即丁、漕、洋税三者，一一分提济用，亦不为过。何况厘金奏定之款，尤为分内应筹之餉，不得目为协餉，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。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，则何处是臣应筹餉之地！（中略）沈葆楨于臣处军餉，论分论情，皆应和衷熟商，元年八九月间臣军疾疫大作，而忠逆大举援救金陵，沈葆楨乃于是时截留漕折银四万，既不函商，又不咨商，实属不近人情。二年浔关洋税一案，关道蔡锦青分拨万五千两解至臣营，沈葆楨乃大怒，严札申飭蔡锦青，并移咨诘

问臣处，但有峻厉之词，绝无婉商之语。此次截留厘金，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。（中略）或臣明于责沈葆楨，而暗于自责。臣例可节制江西，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。臣曾保奏沈葆楨数次，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。然臣阅世已深，素以挟权市德为可羞。即如漕折一案，臣曾函商一次，咨商一次。洋税一案，臣接抚臣峻词诘问之咨，曾经密函婉复。兹特钞呈御览，以明臣不敢有挟权市德之意。自此二案外，臣之公牍私函在江西者极多，其中如有挟权市德措词失当者，请旨飭下沈葆楨多钞数件进呈。

又《复吴竹如^①书》云：

户部疏中言湖北每月协我五万，湖南月协二万五千，江西月协三万云云，实则四川、两〔湖〕广三省，四年以来并无协我丝毫之款，江西除厘金亦别无月解之款，去年浔关解到一月洋税万五千金，因沈中丞盛怒已退还矣。不知户部何故疑我得此巨款。弟尝谓用事日久，恐人疑我兵柄过重，利权太广。

此寥寥数行，感激之心尽吐。大抵谋国重臣，往往最感掣肘者为用财，史例甚多，此其尤著者耳。

一八〇 曾国藩自强策

曾文正公晚年办天津教案，备受无识之谤讥，前已录劄刚日

^① 吴廷栋，字竹如，安徽霍山人。道光五年拔贡。曾署山东巡抚，刑部侍郎。

记中语。其实公之心事方针，坦白精粹，如同治九年奏报中有云：“今中国轮船甫经修造，尚不尽如洋人兵船之式，洋枪洋炮甫经操练，亦不能及洋人技艺之精，至若召募水军出海操演，此时尚未议及。苟欲捍御外侮，徐图自强，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，持以一二十年之久，未易收效。然因事端艰巨，畏缩不为，俟诸后人，则后人又将托词以俟后人，且永无自强之一日。”此言真可谓明白了当者也。所惜前清昏庸孱乱，绝无一二十年之卧薪尝胆耳。尤可太息者，同、光君臣昏庸孱乱，骄奢淫逸，一二十年之后，自谓海军可以出海，遂欲报仇策效，轻易言战，甲申、甲午两役，斫伤元气，荼靡人心，真误国之尤！而文正之言，愈可信为笃论。又文正之外交智识，与谋国之忠，于复吴竹庄、李文忠两书，尤可备见。复吴笺云：“办理洋务，小事不妨放松，大事之必不可从者，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。当康熙全盛之时，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国，自京师至外省名城，几于无处无天主堂。以今日比之康熙时，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，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，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事耳。”复李笺云：“承示驭夷之法，以羁縻为上，诚为至理名言。自宋以来，君子好痛诋和局，而轻言战争，至今清议未改此态。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，然不敢一意主和，盖恐群情懈弛，无复隐图自强之志。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诮而在己亦悔憾者，此也。”观此两笺，可知文正之心事正在于留全力以争持大事，与隐图自强两点。而一翻清末史迹，所见者皆只以全力内争，与隐图自杀，然则文正之论未尝谬，其谬者，乃在清廷上下不知“季孙之忧不在颛臾”也。

一八一 岳飞“痛饮黄龙”本意

文正复文忠笺云，“自宋以来，君子好痛诋和局，而轻言战争”，此盖指南宋韩侂胄柄国后之风尚。其实宋以后之君子议论，皆为党与门户而发，非真言和战也。北宋积憾于辽，于是联金灭辽，自以为复九世之仇，不知辽亡宋亦随之，此等史迹，最可作殷鉴。吾侪读史正似复棋，善弈者须算至七八着之后，方可制胜，睹目前之杀着，震愤失措，必无以应异时之变态。后人复棋，应知前人之失算也。宋人言战者，后世皆歌颂岳武穆，其实凡人能真知之？世但盛传武穆有“与诸君痛饮黄龙”语，以为武穆言战必一往无前。不知此为激励将士之词，黄龙府本为契丹所置，辽称黄龙府路，今辽宁开原以北及吉林全境、内蒙古东北境皆属之，武穆战略，何尝真思深入？昔张魏公浚出督，陛辞之日，与高宗约曰：“臣当先驱清道，望陛下六龙凤驾，约至汴京作上元。”武穆闻之曰：“相公得非睡语乎？”于是魏公憾之终身。夫武穆逆料张浚不能克汴，则自家直捣黄龙，正是对士卒不得不发之壮语。唯从武穆鄙薄魏公之见识测之，武穆战略测算必较优，且甚稳健近情理。必若武穆之知彼，庶可言战矣。

一八二 王船山论岳飞之战守

武穆之能战，以予所观，似尤长于守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最不满武穆者，朱仙镇战后即班师；而《会编》独称武穆郾城传令回

军，军士应时南向，辙乱旗靡，飞望之口呿，叹曰“岂非天乎”云云。世虽不满此纪载，然大捷后回兵，亦容有张极而弛之象，无损于破虏之威名也。唯又记：“岳飞驻镇江府，知泗洲刘纲诣行府禀议。纲曰：‘泗在淮河之北，城郭不固，无兵无食，如有缓急，守乎？弃乎？’飞徐曰：‘此是润州，更有何名？’纲曰：‘京口。’飞再问之，曰：‘丹徒。’飞三问之，曰：‘南徐。’飞曰：‘只此是矣。’纲退，大叹服曰：‘岳鹏举果有过人。’”此则极言坚守之意，其用意又极是斩钉截铁。由武穆之知兵观之，愈可证直捣黄龙，适为一时豪语。王船山之论兹事曰：“岳鹏举郾城之捷，太行义社，两河豪杰，卫相晋汾，皆期日兴兵，以会北讨，秦桧矫诏班师而事不成。然则桧不中沮，率此竞起之众，可以长驱河朔乎？曰：所可望者，鹏举屡胜之兵，及刘锜、韩世忠、二吴之相为犄角耳。”又曰：“弃其所不争，攻其所不可御，东收徐兖，西收关陇，以环拱汴洛而固存之，支之百年，以待兴王之起，不使完颜氏归死于蔡州，以导蒙古之毒，四海犹有冀也。然抑止此而已矣。如曰因朱仙之捷，乘胜渡河，复汉唐区宇，不数年而九宇廓清，见弹而求鸮炙，不亦诞乎？”船山此两节议论，皆极精到。武穆当时之战略，不知能如船山之所拟否？然充其量，亦不过如是，则固谋国论世之所同。船山生丁明季，志切攘夷，然其论史，力斥童贯借金亡辽之非策，力斥王黼挑狡虏之非策。其言有曰：“处于有馀之地，而后可以自立，可以自立，而后可以御人。”有曰：“应之不速，而激其忿怒；应之速，而增其狎侮（言宋对女真）。”皆极深切，可为龟鉴，无遗民诡激借杯浇垒之习。衡湘学人，信未可料哉！

一八三 曾国藩之《挺经》

曾文正自言欲著《挺经》，世多知之，此其刚处。自作《墓铭》曰：“不信书，信运气，公之言，告万世。”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，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，此其柔处。《挺经》之解释，如劼刚之婿吴永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中所述李合肥对吴口述故事云：

我老师（文正）的秘传心法，有十九条《挺经》，这真是精通造化，守身用世的宝诀，我试讲一条与你听。一家子有老翁，请了贵客，要留他在家午餐，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各办肴蔬果品，日已过已，尚未还家。老翁心慌意急，亲至村口，看望见离家不远，儿子挑着菜担，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，彼此不肯让，就钉住不得过。老翁赶上前婉语曰：“老哥，我家中有客，待此具餐，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，待他过来，你老哥也可以过去，岂不两便么？”其人曰：“你教我下水，怎么他下不得呢？”老翁曰：“他身子矮小，水田里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。你老哥身子高长，可以不致于沾水。因为这个理由，所以请你避让的。”其人曰：“你这担内，不过是菜蔬果品，就是浸湿，也还可以将就用的。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，万一着水，便一文不值。这担子身分不同，安能教我让避？”老翁见抵说不过，乃挺身就近曰：“来来，然则如此办理，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，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，我顶在头上，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，再将担子奉还，何如？”当即俯身解袜脱履。其人见老翁如此，作意不

过，曰：“既老丈如此费事，我就下了水田，让尔担过去。”当即下田避让。他只挺了一挺，一场竞争，就此消解。这便是《挺经》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。

据此，则《挺经》之刚，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，虽刚实柔。唯老翁肯具俯身解袜之心，则亦不失挺身负责之刚也。

一八四 曾国藩忍气吞声

吾国史册所纪，重臣鲜能大行其志，不得于君固无论，得君愈专，则谤者愈众，如王荆公、张江陵之类，几于聚天下士大夫争毁之，务令隳其志业为快。盖由无识而热中者众，故任重者必须忍辱，其不得于君，或愠而不察其负谤受辱之由，则为臣者更终无以自全。尝谓吾国所以不能强盛，不能与现代国家絜较，即坐名为士大夫，实际无识挟私者居其八九，轻于诃骂攘夺之故。此劣性不革，国终恐无以活也。

文正之《挺经》，所述老翁愿顶货担之喻，正是满腹牢骚，至刚之道，以至柔之术行之，其吞气忍声，不知几许？考文正不止晚年以主和受厚谤，咸丰七年，在江西军中丁外艰，闻讣奏报后，即奔丧回籍，朝议颇不以为然。左文襄在骆文忠幕中，肆口诋议，一时哗然和之。其实文正若夺情视事，其受谤必更有甚。文正有鉴于此，故处处善用其刚，以柔全之，用维全局，否则祸福成败固不可知矣。当时，挟其贵势，深忌汉人，独专威柄者有之；比肩事主，不甘听命者有之；嫉公名誉独盛者有之；赏罚任使之际，不尽如人意，因而觖望者尤有之。故文正于节制江浙四省、节制

直鲁豫三省之令，皆属疏力辞，始终不肯拜命。同治四年九月，又有节制楚北之谕，文正疏陈，有云：“湖广督臣官文，久历戎行，老成持重，资格在臣之先，名位居臣之右。所有湖北防务及越境剿贼诸军，久经官文派定。乃以臣分居节制之名，纵官文不稍存芥蒂，而骇中外之听闻，滋将士之疑贰，所关实非浅鲜。天下至大，事变方殷，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，伏恳朝廷广收群策，不因用一二人而沮众臣之气。”观此疏，苦心巽语，令人恍然。夫事实上非用此一人，不能收拾此局，而文正乃曰“不因用一二人而沮众臣之气”，此其量与识为何如？其中心苦痛为何如？然即此可知晚清“众臣之气”实皆虚骄昏聩，不足以救中兴之眚，而必覆其宗社也。

一八五 为政在养活细民

开国与亡国之时势皆相似，而气象则迥殊。所谓时势相似者，殷忧多难，险巇万端，纣以甲子亡，周以甲子兴是也。所谓气象迥殊，则颇难言。要而论之，延揽人才唯恐不及，有公诤而无私仇，严于律大官而宽于恤小民，此三者庶几仁厚开基矣。叔末三者适得其反，自不俟言。以予所观，近代贤者有此气象者，唯曾文正公具体而微。尝从文正戚属家获观文正遗象，隆准而目有棱，自是沉挚之才。然其幕府招致贤豪特多，其不自恃不自满可知。其与左、沈皆极不相下，或形于笔舌，而绝无倾轧陷害之私。尤以其开放秦淮灯船一事，深得治要。

予幼读《史记》，初不审曹参不扰狱市之旨。涉历久之，始叹

曹相国此举，真是汉家开国规模。狱市者，古人以为下流狙佞，揆其实训，乃如今日恒言，中下层社会游衍拘聚所在者，皆不必以察察为明也。文正兹事与曹参为政暗合。欧阳伯元所述文正逸事，中纪此节云：

当时江宁府知府涂朗轩，名宗瀛，为理学名臣。方秦淮画舫恢复旧观也，涂进谒文正，力请出示禁止，谓不尔，恐将滋事。文正笑曰：“待我领略其趣味，然后禁止未晚也。”一夕公微服，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，同泛小舟入秦淮，见画舫蔽河，笙歌盈耳，红楼走马，翠黛敛蛾，帘卷珍珠，梁饰玳瑁，文正顾而乐甚，游至达旦，饮于河干。天明入署，传涂至曰：“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，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，但闻歌舞之声，初无滋扰之事，且养活细民不少，似可无容〔庸〕禁止矣。”涂唯唯而退。

此是何等胸襟，何等见识！盖政治之精意，即在养活细民四字，在国家未有养活细民较大之計畫，或议而未举时，于可以养活细民之琐俗，正不妨存之。为政者须有轻重缓急之分，凡急其所缓者，适见其不广，不广之病，不止于扰狱市，而扰狱市，乃其尤拙隘者耳。

一八六 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

古人凡当一方面者，无不妙选幕僚，其作用有二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；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，资其见识以救国疏失，丰其俸养，勿使去而为患。即论历代开国用人，其意义

何莫非如是。文正幕府人材济济，有三圣七贤之目。三圣，谓吴竹如、涂朗轩诸人；七贤，谓邓弥之、莫子偁诸人。故文正诗句有云：“幕府山头对碧天，英英群彦满樽前。”李文忠当时有《将进酒》体古风一什，叙述佐幕人物之盛。诗云：

南丰老人应寿昌，说经舌粲莲花香；
往往谈兵惊四座，却行伤足怨迷阳。
吾宗文雅兼武略，浙东争诵小诸葛。
佞佛仍持苏晋斋，凌云未解相如渴。
诗家许浑殊翩翩，苦吟欲度饭颗前。
更有王郎歌砍剑，泻地涌出百斛泉。
满堂豪翰济时彦，得上龙门价不贱。
牡丹时节金带围，定有五色云中见。
短主簿，髯参军，纵横阵笔风运斤。
为公折简访倪迂，添写江楼雅集图。

按文忠此诗，“吾宗”句，指李次青元度。“许浑”句，指许仙屏振祎。“王郎”句，谓王壬秋闾运。诗不甚佳，自非文忠所长。文正幕客，亦当未止此数。三圣七贤，亦有时诟诮，如李眉生所嘲“此心终不动，只想见中堂”者，实皆不足为病。盖文正延揽罗致之衷，固与古人延贤治国之大计相合。以彼网罗之亟，度量之宽，而才人若钱江、王韬辈，尚未及致之。钱上《兴王策》十四条于太平军，天王用之以取金陵，再用钱谋，以复败江南大营。王上书忠王，献取上海策，李若用之，事未可知。人才处囊，正不易见短长，一旦激使走险，或逼使投敌国，则得失祸福，相去甚远。以范文正之贤，失一张元，而西夏为宋祸数十年，此其彰明较著